

# 现代化的入场券

## ——一个历史性的QCA分析

黄振乾，唐世平

（注：此为2018年6月工作论文，引用请参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 内容摘要：

现代化开启于西欧的少数几个国家。因此，现代化的最本源问题之一是：为什么有的西欧国家能率先进入现代化，而别的西欧国家不能？通过构建新的数据集，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本研究为现代国家兴起提出了一种新解释。我们发现，从大西洋贸易兴起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近两百年的第一波现代化中，初始制度、初始经济规模和大西洋贸易三要素对国家崛起至关重要，其中参与大西洋贸易是必要条件。在此期间，两类国家更可能崛起：一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二是参与大西洋贸易且初始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英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葡萄牙七国获得了第一波现代化的入场券。

**关键词：**初始制度；大西洋贸易；改革同盟；定性比较分析

黄振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作者感谢叶成城、刘建军、何俊志、陈周旺、朱方、熊易寒、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eworski）、郑宇、胡鹏、何浏阳、曹航、王凯、周晓加、王子夔、郝诗楠和付建军提供的修改建议；感谢契瓦克·卡拉曼（Kivanc Karaman）和谢尔科特·帕慕克（Sevket Pamuk）和刘立之慷慨提供的研究数据；感谢2013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制度分析》课程学员、2014年4月复旦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工作坊参加者和2017年5月复旦大学“士派”学术工作坊参加者的有益讨论。

## 导论

国家兴衰是其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常见的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科学问题。学界对国家兴衰根源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但依然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2005年出版的《科学》杂志特刊仍然将国家兴衰视为人类社会有待解决的125个重要问题之一<sup>①</sup>。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国家兴衰的研究有如汗牛充栋，其中对早期现代国家兴起的探索尤其引人瞩目：为什么有的国家能率先进入现代化，而有的国家没能乘上现代化的大船，有的国家反而在现代化过程中衰落了？既有研究从地理位置、产权保护、海洋贸易和白银冲击等视角来解释现代国家的兴衰问题，这些解释深化了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缺憾，尚有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新历史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因果推论方法的进步（因果机制重要性逐渐被社会科学家们认可）以及新的分析工具（如QCA）的开发，使得我们有机会改进和提升我们对现代国家兴衰问题的认识。对早期现代国家兴起进行研究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尤为重要，它不仅能丰富我们对国家兴衰根源的这经典问题的理解，还能为现在依然挣扎在现代化泥潭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思路。

通过创建新的数据集，结合定性比较分析工具（QCA），我们对16世纪大西洋贸易兴起到法国大革命两百年间，即“第一波现代化”的26个欧洲国家进行了更加系统性的分析<sup>②</sup>。如果将获得现代化的条件视为现代国家崛起的“入场券”，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第一波现代化中，一个国家要崛起为现代强国，必须积极参加大西洋贸易（必要条件），并且在此基础上，还要具备初始制度开明和初始经济规模两个因素的不同组合。由此，有两种类型的国家更可能获得第一波现代化的入场券：

---

<sup>①</sup> Kennedy Donald and Colin Norman, “What Don’t We Know?”, *Science*, Vol. 309, No. 5731, 2005.

<sup>②</sup> 我们将1492新航路开辟到1711年的现代化界定为“第一波现代化”，而将西班牙王位争夺战（1700年-1711年）到法国大革命（1789）这期间定为“第一波半现代化”。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将这两个时段均视为第一波现代化。这个时段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现代化仅仅局限于西欧部分。详细的讨论，参见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年第3期；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5期。我们将1575年莫斯科威公司（Muscovy Company）成立作为大西洋贸易兴起的标志。1575年之前，大西洋只有零星的偶发性的贸易，并未形成规模。

1) 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2) 参与大西洋贸易且初始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这些有幸获得现代化入场券的国家分别是：英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葡萄牙。特别需要提到的是，荷兰几乎拥有现代国家崛起的所有条件，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为此，我们将荷兰视为一个奇怪的负面案例（deviant negative case）进行分析。

此研究是我们“重新解释现代化”研究项目一部分，此前已经发表姐妹篇研究成果包括叶成城和唐世平（2015年）、叶成城和唐世平（2016年）和叶成城（2017年）<sup>①</sup>，上述三篇文章侧重从因果机制和案例分析的角度对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兴衰进行。相比之下，此篇旨在通过更大样本范围的定性比较分析来呈现哪些因素和因素组合对早期现代化有决定性影响。

我们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理论方面，我们研究发现强调初始制度条件对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弥补了部分现代化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同时，我们的研究契合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建设理论的探索，并在实证上丰富了16世纪到18世纪间的国家建设研究（对该时间段的国家建设证实研究较少）。政策方面，首先，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了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对国家兴盛的重要作用，可对当下陷于全球化和反全球贸易的争论中的国家如何认识贸易的作用提供政策启示；其次，我们的研究表明国家要获得长盛不衰的竞争优势，最根本的出发点在于不断进行制度改革，不断增强改革同盟的力量，这不仅是早期现代国家崛起的成功经验，也是当下不少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根源所在。

除导论外，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现有理论发展和缺陷，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解释国家兴衰；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介绍我们如何发展新的理论以及提出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介绍主要的变量、数据和案例选择；第四部分展示定性比较分析结果，检验我们提出理论和研究假设；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

---

<sup>①</sup> 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年第3期；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5期。

## 一、重新解释现代国家兴起

### 现有研究的进展和缺憾

社会科学家对国家兴衰的既有研究有如汗牛充栋。为了不挂一漏万，厚此薄彼，也考虑到理清既有理论对提出新解释的重要性，我们对早期现代国家兴起的主要竞争性解释进行较为细致的归纳和批评。我们发现虽然很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都对现代欧洲兴起提出了丰富多彩的解释，但具有较强解释力且严格按照社会科学方法来完成的研究还比较少，对第一波现代化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尤少<sup>①</sup>。

定量研究者如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和戴维·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等学者的研究的涉及到早期欧洲国家兴起的问题，但是一般也只是将其视为长时段经济分析的一部分<sup>②</sup>。事实上，第一波现代化不仅是欧洲经济分化时期，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分水岭，也是欧洲从中世纪历史最终走入现代历史的关键节点。如果不对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深入分析，我们很难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和机制导致现代化的分化<sup>③</sup>。

---

<sup>①</sup> 1500年到1800年的城市人口数据（其它经济发展数据人均GDP之类的则更少），数据一般也是以100年或50年为单位，而一些历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收集的数据也是非系统性的，数据质量低而无法进行科学的因果推断。1800年之后的数据则相对比较丰富和系统，如著名的政体数据Polity起始点也是1800年。Karaman, K. Kivanc和Şevket Pamuk最近发表的文章则收集整理了1500年到1800年欧洲12个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数据集，但显然还不够系统。参见Karaman K. Kivanc and Şevket Pamuk, “Different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rfar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Regim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7, No.3, 2013.

<sup>②</sup>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5, No.3, 2005; Scott Abramson and Charles Boix, “The Roo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r (Socially Embedded) Know-How?”, Working Paper, 2012; Epstein Stephan R., *Freedom and Growth: The Ris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 1300-1750*, London: Routledge, 2002; Stasavage David, “Was Weber right? The Role of Urban Autonomy in Europe’s Ri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8, No.2, 2014; Abramson Scott,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1, 2016.

<sup>③</sup> 对于关键节点的在方法论和因果解释的重要性可参见Slater Dan and Erica Simmons, “Informative Regress: 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3, No.7, 2010; Capoccia Giovanni and R Daniel Keleme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Vol.59, No. 3, 2007; Pierson Paul, “Big, Slow-moving, and... Invisible: Macrosocial Processes in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Mahoney Jame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77-207.

定性研究者则将目光局限在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国家。当然案例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可能发现欧洲政治经济变化的蛛丝马迹，并且让因果解释变得精致和有力，但前提是必须遵循严格案例选择和分析方法。单案例研究对理论的外延而言作用有限<sup>①</sup>，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和巴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对17世纪英国制度演化的分析即便能够解释英国率先完成制度变革，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其它国家没有像英国一样完成制度变革<sup>②</sup>。多案例研究在理论外延上较为有用，但案例选择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托马斯·艾特曼（Thomas Ertman）对早期欧洲国家建构的比较案例分析较好的解释了欧洲国家建构的不同路径，但是对时空的理解尚有欠缺<sup>③</sup>。肯尼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研究了东西方现代经济发展分化的原因<sup>④</sup>。此外，一些学者还从国家建构、战争学说、文化因素和生产方式等解释现代国家的兴起<sup>⑤</sup>。根据解释的关键变量上的主要差异，我们重点分析四种关于现代国家兴起的竞争性解释（表1）。

表1 四种竞争性解释

竞争性解释	核心解释变量
地理假说	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差异导致经济发展结果差异。强调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单一因素且描述性解释。

<sup>①</sup> 单个案例研究的因果效用可参考 Gerring John,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6 and 7.

<sup>②</sup> North Douglass and Barry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9, No. 4, 1989.

<sup>③</sup> Ertman Thomas,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reif Avner, “Self-enforcing Political Systems and Economic Growth: Late Medieval Genoa”, In Bate Robert H, ed., *Analytic Narrativ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63

<sup>④</sup> 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sup>⑤</sup> Tilly Charles,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Oxford: Blackwell, 1992; Ertman Thomas,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LLC, 2010; Karaman K. Kivanc and Şevket Pamuk, “Different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rfar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Regim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3, 2013; Blaydes Lisa and Christopher Paik, “The Impact of Holy Land Crusades on State Formation: War Mobilization, Trade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edieval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0, No. 3, 2016; Hechter Michael and William Brustein, “Regional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Patterns of State Formation in Western Europ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5, No. 5, 1980.

产权保护说	产权保护学说和城市自主学说，只有那些有完善产权保护和商业自由的国家，才更可能率先实现经济发展。
白银冲击说	海外贸易和外部白银流入引发不同国家的阶级分化，阶级分化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分化。
贸易假说	是否参与大西洋贸易会影响到欧洲各国经济发展的社会后果，参与大西洋促进经济发展，不参与大西洋贸易导致经济落后。

**地理假说。**简单的地理假设是一种单一因素的决定论，认为世界上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地理上的差异导致的。复杂的地理假说将时间作为一个控制变量来优化地理解说，即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地理因素拥有显著的差异：在在技术都非常落后的前现代时期，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可能是决定性的。但对于现代国家而言，随着技术传播和知识传播的进步，地理因素的重要性相对下降。复杂的地理假设则将技术和时间融入到经济发展的分析中<sup>①</sup>。

**产权保护说。**产权保护学说认为只有那种保护产权的国家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产权保护学说衍生出的解释包括只有那些宪政国家才能实现长期经济发展，而攫取型的国家则不太可能实现经济发展。<sup>②</sup>产权保护比较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法国率先实现现代化，但无法解释在那些同样拥有商业贸易受到保护，国家权力受到约束的地中海城邦国家如东欧的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岛国为何也没能实现经济发展？史蒂芬·爱泼斯坦（Stephan Epstein）对欧洲国家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即便国家保护产权也可能造成商业垄断和市场控制，从而阻碍的经济发展。<sup>③</sup>戴维·斯塔萨维奇（David Stasavage）和斯科艾布·拉姆森特（Scott Abramson）对西欧城市自主性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也表明城市自主性和经济发展之间有关系<sup>④</sup>。

<sup>①</sup> Mokyr Joel,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Aghion Philippe and Steven N. Durlauf ed.,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1, 2005; 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待刊）；叶成城：“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sup>②</sup> Acemoglu Daron, James A. Robinson and Dan Wore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2.

<sup>③</sup> 如地中海的城邦国家和欧洲大陆的部分城市，由商业组成的贸易委员会往往垄断了国家的贸易且阻止外来竞争，反而阻碍经济发展。参见 Epstein Stephan R., *Freedom and Growth: The Rise of States and Markets in Europe, 1300–1750*, London: Routledge, 2002.

<sup>④</sup> Stasavage David, “Was Weber right? The Role of Urban Autonomy in Europe’s Ri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8, No.2, 2014; Abramson Scott, “The

**白银冲击说。**张宇燕和高程提出“货币增长—财富重组—阶级结构变化—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解释模型<sup>①</sup>。他们认为货币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导致欧洲的财富重组。在国家内部对新财富的分配和重组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再加上大量白银流入引发的“价格革命”，社会阶级分化进程加快，商人阶层崛起，商业阶级诱发制度变迁，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张和高解释解释模型细化了解释的因果链，探索了经济增长的具体过程，也抓住了几个制度变迁的关键要素<sup>②</sup>，但他们忽略了不同国家历史复杂性，过分强调了欧洲国家的同一性<sup>③</sup>。白银冲击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样面对美洲白银的外部冲击，经历社会财富重组和社会阶级分化的情况下，不同国家对外部白银冲击有不同的反应。

**贸易假说。**贸易假说核心为大西洋贸易假说。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提出的大西洋贸易说，其核心观点认为：欧洲1500年以后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发展和大西洋贸易有关系。大西洋贸易假说认为1500年到1850年间，能够参与大西洋贸易的西欧国如英国、法国，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西欧的非大西洋贸易国如奥地利、比利时，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显著<sup>④</sup>。大西洋贸易说看到了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大西洋贸易说虽然看到了大西洋贸易的正面作用，但依然属于因素式的解释，它基本未考虑不同因素组合的作用，忽视了因果的复杂性，从而未看到大西洋贸易必须通过和其它要素相互作用才能推动经济增

---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1, No.1, 2016.

<sup>①</sup> 张宇燕、高程：“美洲白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

<sup>②</sup> 制度变迁可分为五个阶段：1) 产生出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概念；2) 政治动员；3) 围绕制度制定权（即设计制度的权力）展开政治权力斗争；4) 获得胜利的一方创建制度；5) 使制度合法、稳定并进一步被复制。虽然不是每次制度变革都明显的经过上述几个阶段，但这个分析是对我们分析欧洲的制度变迁有帮助：解释欧洲的新阶级（商人阶级）是如何通过政治动员、如何争夺制度制定权，并成功实现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参见 Shi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34.

<sup>③</sup> 张和高认为：“一旦了解了英国革命和产权制度的过程，之后发生在西欧其他国家的一切就不难理解了。欧洲大国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及阶级构成均与英国相似，议会在财产权问题上与国王之间的矛盾也和英国大致相仿。这些国家同样受到美洲金银的外部冲击，并经历了社会财富的重组、阶级结构及国家性质的变化过程”。参见张宇燕、高程：“美洲白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sup>④</sup>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5, No.3, 2005.

长。此外，大西洋贸易说忽视了制度变迁过程中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即新兴商业阶级是如何通过权力斗争来实现制度变迁的，抑或说影响到欧洲经济发展的那些关键行为体之间的是如何互动的，因为制度变迁是行为体间利益博弈的结果。

综上所述，现有解释依然存在如下某个或几个问题：一是缺乏对初始条件的准确分析，特别是忽视了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规模的差异，忽视对起始条件的有效分析使得研究者很难抓住真正的因果关键节点<sup>①</sup>；二是试图用单一因素解释欧洲国家的兴起，忽视因素之间可能的组合与互动，因此未能提供可信的因果机制。部分既有解释都提到经济增长的一些可能重要的要素，如资本、地理、文化、战争和、贸易和制度，但是单一因素可能重要但不太可能是欧洲国家崛起的充分必要条件，甚至可能是不必要条件<sup>②</sup>；三是忽视了关键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联盟或分裂）对社会结果的影响。制度作为一种资源分配和冲突处理的机制，必然和利益团体之间的集体行动相联。这种互动模式对解释欧洲国家为何在呈现兴衰差异，以及在兴衰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很重要，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分“波浪式”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间进入现代化<sup>③</sup>。针对此问题，叶成城和唐世平对第一波现代化的研究表明，这些条件必须通过一个驱动机制才可能导致现代化<sup>④</sup>。我们需要思考，相同的因果机制为什么导致了差异性的社会后果（如商业自主在英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在地中海城邦国家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四是大部分研究都未能没有提供一个好的数据集。现有理论的发展为新的理论解释提供了方向，竞争性解释中的缺憾恰恰为本研究希望弥补的地方。

---

<sup>①</sup> 不同的起点分析完全可能改变因果推理，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分析起点，对此讨论参见 Slater Dan and Erica Simmons, “Informative Regress: 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7, 2010; 此外要素出现时间顺序也可能改变因果推论，参见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待刊）。

<sup>②</sup> 案例研究中的因果充分（必要）条件经常用来验证因果假设的有效性，通常和过程追踪一起运用。参见 Collier David, “Understanding Process Trac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44, No. 4, 2011; Mahoney James, “The Logic of Process Tracing Tes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 41, No. 4, 2012.

<sup>③</sup> 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待刊）。

<sup>④</sup> 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 定性比较分析的优势

定性比较分析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即QCA) 是一种建立在布尔代数和模糊集基础之上的比较研究方法和因果推理方法。近年由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 (Charles Ragin) 引入比较政治研究, 其价值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的重视<sup>①</sup>。与回归分析逻辑迥异, QCA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 旨在弥补小样本案例研究 (small-N) 和大样本回归分析 (large-N) 之间的研究空白 (拉金称之为社会科学研究“U型”偏见)。大部分案例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等样本 (如10到30个) 研究的将变得不太可靠<sup>②</sup>。QCA方法的进步为中等样本的研究对象提供了一种可行思路, 定性比较分析着重探索不同因素组合如何导致相同的社会结果<sup>③</sup>。国内较早使用定性比较分析的是何俊志、王维国、黄荣贵、桂勇、唐世平和唐睿等学人<sup>④</sup>。

因此, 在社会科学中遇到中等样本的研究问题适合使用QCA。QCA分析在这种情况下, 比起一般统计分析和案例比较有如下优势: 一是它可以运用到统计分析因观察值不足或案例比较分析因案例太多而无法适用的研究对象中; 二是它能发现一般统计分析发现不了的重要变量或导致同一社会结果的条件组合。和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样, QCA也不是一种完美无缺的方法, 例如它在数据编码、测量和因果推论中还面临一些改进的问题<sup>⑤</sup>。另外, QCA仍旧是一个基于因素的方法, 而不能直接甄别和

---

<sup>①</sup> Charles Ragin 将 QCA 引入比较政治研究的三部代表性作品分别是: Ragin Charles,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Ragin Charles,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Ragin Charles,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sup>②</sup> 案例研究受到变量数量的限制, 案例太多导致变量控制变得复杂而困难。统计回归分析受到中心极限定理的限制, 一般而言小于 30 个观察值则不能运用统计回归分析。

<sup>③</sup> Ragin Charles,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Chapter 1.

<sup>④</sup> 何俊志: “社会科学中的模糊集方法”, 《社会科学》, 2013 年第 5 期; 何俊志、王维国: “代表结构与履职绩效—对北京市 13 个区县的乡镇人大之模糊集分析”, 《南京社会科学》, 2012 年第 1 期; 唐睿、唐世平: “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 26 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 QCA 的双重检测”, 《世界政治与经济》, 2013 年第 2 期; 黄荣贵、桂勇: “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方法的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9 年第 5 期。

<sup>⑤</sup> 社会科学家对 QCA 的批评、争论和讨论, 可参考政治学研究方法刊物 *Political Analysis* 的相关讨论。如: Seawright Jason, “Testing for Necessary and/or Sufficient Causation: Which Cases Are Relevant?”, *Political Analysis*, Vol.10, No.2, 2002; Ragin Charles, “Set Relations in Social Research: Evaluating Their Consistency and Coverage”, *Political Analysis*, Vol.14, No.3, 2006; Hug Simon,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How Inductive Use and Measurement Error Lead to Problematic Inference”, *Political Analysis*, Vol.21, No.2, 2013.

确立机制。但是，QCA因为能够找出因素的组合，因此，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找到甄别和确立机制的方向，因为，按照我们的理解，机制必须是能够搅动因素的组合而驱动变化的过程<sup>①</sup>。

使用QCA分析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有下述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案例优势。中世纪结束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存在不到30个的国家（或政治实体），我们研究样本为23个，案例的数量适用QCA。而这段时间，缺乏国家分析单元的连续数据，使得通常的统计分析观察值不足；二是因素相互作用的的优势。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克服单因素解释的不足，较好的捕捉不同要素组合对欧洲国家兴衰的影响。考虑到欧洲社会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定性比较分析对对此类问题更为可取。

##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 因果框架

新航路开辟后，大西洋贸易逐渐兴起，大西洋贸易作为一个新经济增长点，对欧洲国家兴衰应有显著影响。能否参与大西洋贸易会对影响到欧洲国家的经济分化。作为贸易的主体，欧洲国家的商人能否参与大西洋贸易不仅仅取决于地理位置，还取决于国家本身的制度和政策。显然，在大西洋贸易开始之前，国家的初始的制度条件是给定的。大西洋贸易关乎新兴商人阶级的力量形成和壮大，商人团体自然有“改革开放”的诉求，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获取更多利益。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商人的动机、还受到其能力和策略的影响，商业阶层会寻求通过和开明的国家政治精英结盟，组成改革同盟。改革同盟通过制度平台如议会、城市委员会等决策平台和就制度进行政治博弈，这样就将政治制度和经济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种利益关系类似于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所描述的“绑定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up>②</sup>。换言之，这种经由大西洋贸易兴起，受到初始制度条件约束，并通过精英联盟来进行制度变革能够影响到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在此期间率先从众多国家中脱颖而出。

---

<sup>①</sup>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唐世平：“观念、行动和结果：社会科学的客体 and 任务”，《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待刊）。

<sup>②</sup> Olson Mancur,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 3, 1993.

此外，我们认为初始的经济规模对国家崛起而言也应是重要的。因为初始经济规模国家是否有足够动机参与大西洋贸易并进行制度改革有关系。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初始经济规模小的国家比原有的经济规模较大的欧洲国家：1) 有更强的国家崛起危机意识和生存压力，更希望通过贸易来扩大自身的国家实力；2) 更不容受到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束缚，不仅更乐意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更可能进行制度改革和新技术运用<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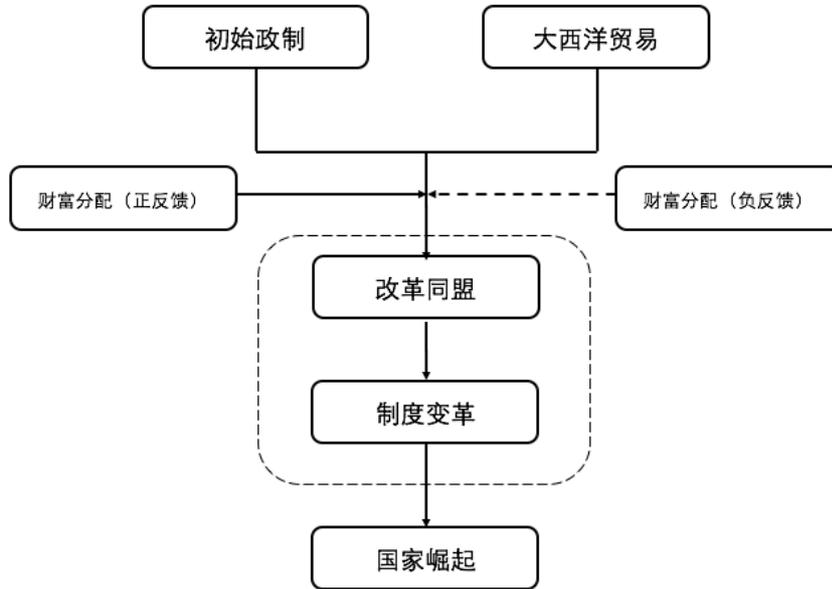
据于此，我们提出一个不同因素的组合如何影响国家兴起的因果框架（图1，虚线箭头表示负作用）。我们理论预测是：早期欧洲国家兴起的逻辑起点是初始制度和 大西洋贸易，两者的互动决定了新兴商业阶层力量的成长，商业阶层和开明政治精英会形成一个改革同盟，来改变束缚贸易发展的旧制度，然后通过制度变革来获取和扩大新的利益，从而客观上推动了国家崛起。那些实现了政治制度从偏好旧利益集团到保护商业利益转变的国家，更可能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先成为早期现代强国。当然，一个社会结果的产生是利益、能力、意图和外部环境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能力的国家不一定有变革的动机，有崛起动机的国家不一定有相应的能力<sup>②</sup>。国家崛起是最终分析结果，改革同盟和制度变革是中间过程。

---

<sup>①</sup> 初始经济规模在我们最早的研究计划中并未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随着我们对文献和数据的进一步把握和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初始经济规模是早期欧洲国家兴起一个必须纳入考虑的变量。一些学者对早期国家规模（部分涉及城市和经济）和欧洲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影响的探讨可参见：Hintz Otto, “The Formation of States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 Study in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Felix Gilbert ed.,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157-177; Stasavage David, “When Distance Mattered: Geographic Sca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4, No. 4, 2010; Rokkan Stein, “Cities, States, and Nations: A Dimensional Model for the Study of Contrasts in Development”, in S. N. Eisenstadt and Stein Rokkan ed., *Building States and Nations: Models and Data Resources*, Sage Publications, 1973; Rokkan Stein, “Dimensions of State Form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A Possible Paradigm for Research on Variations within Europe”, in Tilly Charles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562 - 600.

<sup>②</sup> 参考唐世平对此问题的讨论 Shiping Tang, “Idea, Action, and Outcome: The Objects and the Tasks of Social Sciences”, Working Paper, 2017; Shiping Tang, “The Reaches of the Social System: Six Channels”, Working Paper, 2016; Shiping Tang, 2012. “Outline of a New Attribution Theory in IR: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No.3, 2012.

图1 因果关系图示



## 研究假设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四个核心的研究假设和一个辅助性假设：

**假设1：**在起始制度专制，且未能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商业阶层基本不可能通过获取新的利益获得成长，改革同盟不太可能存在，变革动力不足，国家崛起可能性最低；

**假设2：**在起始制度专制，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能够通过获得新的利益，但成长受到制度限制，可能存在改革同盟，但改革同盟能力不足以推动制度变革，国家崛起可能性低；

**假设3：**在起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迅速壮大，有助于改革同盟形成，改革同盟能力可能较强，通过变革可能性较高，国家崛起可能性最高；

**假设4：**在起始制度开明，但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成长有限，形成改革同盟的动力不足，即便存在改革同盟，改革同盟能力不足，变革的诱因不足，国家崛起的可能性低。

除上述几个主要变量之外，国家的规模也需要考虑（在分析中，我们将国家的规模将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虽然历史上国家崛起主要是大国的故事，太小的国家不具备崛起的条件或崛起了也没有太大的国际影响力。但从经济维度上看，我们认为国家崛起并非是大国的专利。理论上，国家兴衰和国家大小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此外，如何分配和使用从大西洋贸易以及殖民地贸易获得的财富对西欧国家崛起有辅助作用：如果外来财富被政府垄断或用于消费，对崛起有阻碍作用；如果外来财富用于再生产或扩大贸易，则对崛起有促进作用。我们将此视为研究的辅助性假设。

理论上，我们认为这些变量之间仍然是相对独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不会相互影响。和统计分析不同，定性比较分析在处理变量之间有一定关系的因果关系中更有优势，它并不要求变量绝对独立性。

### 三、研究设计

#### 因变量

**国家崛起。**新航路开辟之后，国家的崛起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率先进入现代化。我们用长期的经济增长来度量国家崛起，而不是简单某一个时间点的经济绩效。受到历史数据的制约，我们用两个主要指标来测量早期国家的发展状况。一是经济指标，也是我们QCA分析的主要指标，即1575年到1789年间欧洲各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sup>①</sup>；二是辅助指标，我们用欧洲国家的人均税收变化来辅助度量。长期而言，只有那些经济发展好且能力较强的国家才能够维持税收的增长（暴力和战争可能在某个短期的时间内能够从公民征收较高的税收，但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

#### 自变量

**初始制度。**在此项研究中，我们所指的初始制度，主要是初始政治制度（以下简称“初始政制”或“初始制度”）。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认为初始条件的重要性有三个原因：一是时间顺序是不可逆的，发生之后就不会再出现第二次；二是起点改变了资源配置或激励结构，因而能够塑造社会行为体的行动和选择空间，通过行为体的行动，历史的轨迹便随之改变；三是起点之后可能出现路径依赖<sup>②</sup>。路径

---

<sup>①</sup> 受到历史数据的限制，我们的实际测量指标为 1500 到 1820 年的数据。

<sup>②</sup>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4; 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

依赖也是历史制度分析的重要路径<sup>①</sup>。研究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制度遗产对后来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sup>②</sup>，因而国家崛起的分析中对初始政制的识别是有必要的。大西洋贸易开始之前建立的初始制度（中世纪时期各政治实体的政治制度）有的对国家权力有比较明显的制约（如英国），而有的国家则王权强大，几乎不存在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如西班牙）。

**大西洋贸易。**如上文所言，新航路的开辟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可视为欧洲国家发展的一种外部冲击。当大西洋贸易成为新的国际贸易中心和利益点之后，谁能够参与（主导）大西洋贸易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和经济问题：如不能参与到大西洋贸易就意味着无法获取大规模的经济利益。因此，参与大西洋贸易作为一种资格或是权利，蕴含着引发社会变革的机会。随着贸易对经济发展作用的不断提升，能否参与大西洋贸易逐渐成为欧洲国家发展分化的分水岭。

**改革同盟。**改革同盟指商业阶层利益和政治精英形成的旨在改变现有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明显的或是隐性的同盟。在改革同盟比较强的国家，比如在那些议会对君主权力有实质性限制的国家（如英国）；与之相反，在当时的西班牙，商业贸易基本是国王和王族垄断的，改革同盟难以形成，即便形成其力量也比较弱小。改革同盟会形成改革压力和改革机会：一是贸易中的既得利益者会尽力阻碍有损其利益的制度和政策。如商业阶层的利益占优，则可能阻碍向商人增加收税的税收政策在议会中通过；二是贸易中的既得利益者会利用或诱导权力巩固，扩张或维护特定利益。如国王在大西洋贸易中变得更加专制。

**初始经济规模。**初始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有负效应也可能有正效应。一方面，初始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更有实力投入到贸易中，国家更可能有能力保护贸易安全，足够大的经济规模可能带来规模效益；另一方面，经济规模较大的

---

时间”，《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待刊）。

<sup>①</sup> Hall Peter and Rosemary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5, 1996; 文世界中对历史制度主义的介绍和分析可参见何俊志：“理性、行动和制度：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②</sup> Pop-Eleches 的对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制度遗产会对制度转型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Pop-Eleches Grigore, “Historical Legacies and Post-Communist Regime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 26 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 QCA 的双重检测”，《世界政治与经济》，2013 年第 2 期。

国家不见得有足够的动力参与贸易。而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在面临竞争和生存危机的时候，更有动力参加贸易，扩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从欧洲的历史来看，欧洲崛起的过程就是中世纪的强国最后变成了现代弱国，而较为弱小的国家反而迅速崛起为强国的过程。

**国家大小。**国家的大小在本研究中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控制变量。虽然近代史被描述成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故事，大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上有自身的优势，但也可能在制度创新上有自己的劣势。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维度看，我们认为国家大小对欧洲国家的兴起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 样本选择

我们的研究对象涵盖1575年到1789年间所有主要欧洲国家和政治实体，一共为23个的案例样本<sup>①</sup>。案例研究有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sup>②</sup>全案例研究将不存在案例选择偏差的问题<sup>③</sup>。首先，为了更好的研究不同国家崛起的路径，我们在案例设计中根据自变量和因果关系将案例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第二类是初始制度开明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第三类是初始制度专制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第四类是初始制度专制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次，为了更好的验证我们的假设，我们在定性比较分析中也将对出现的正面案例和负面案例进行分别分析和说明<sup>④</sup>；再次，我们也会引入普鲁士、奥斯曼、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等作为参考案例，从而夯实理论解释力。

### 图2 案例类型

---

<sup>①</sup> 研究涵盖的案例国家/政体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普鲁士（德意志）、荷兰（尼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威尼斯、维琴察、佛罗伦萨、热亚那、那不勒斯、波伦亚、米兰和罗马。此外，奥斯曼、匈牙利、波兰和俄罗斯在文中作为参考案例，间或在分析比较时候使用。

<sup>②</sup> 案例研究优势可参见：Gerring John,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3; Gerring John, “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8, No.2, 2004.

<sup>③</sup> 关于案例选择偏误可参考：Giovanni Sartori, “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3, No. 3, 1991; Geddes Barbara, “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Analysis*, No.2, 1990; Brady Henry and David Collier, ed.,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Chapter 6.

<sup>④</sup> 正负案例对因果解释的作用参考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8, No. 4, 2004.

	参与大西洋贸易（是）	参与大西洋贸易（否）
初始政制专制（否）	<b>第一类</b> 制度变革, 国家崛起。主要案例: 英国、荷兰、芬兰、挪威、瑞典和瑞士。	<b>第二类</b> 制度维持, 国家停滞。主要案例: 希腊和地中海城邦国家、希腊。
初始政制专制（是）	<b>第三类</b> 制度维持, 国家崛起可能性低。主要案例: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	<b>第四类</b> 制度维持, 国家衰落。主要案例: 奥地利、比利时和德国。

## 四、定性比较分析

此部分为研究的实证分析内容, 我们将展示如何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来检验我们的假设。首先, 我们通过描述性的历史证据展示不同类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其次, 我们也将逐一检视单个因素的解释力。最后, 我们将呈现定性比较分析的结果。

### 描述性证据

从第一个测量指标看, 我们发现第一类国家的经济增长平均值超过所有国家的平均值。第二、三、四类国家低于所有国家的平均值(表2)。经济发展表现最高的是第一类国家。数据描述初步表明, 初在所有四类国家中, 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最可能崛起成为现代强国。

表2 不同类型国家比较

国家类型	经济增长百分比(均值)	所有国家经济增长平均值	差值	备注
第一类国家	0.37	0.29	+0.08	高于平均值
第二类国家	0.27	0.29	-0.02	低于平均值
第三类国家	0.26	0.29	-0.03	低于平均值
第四类国家	0.25	0.29	-0.04	低于平均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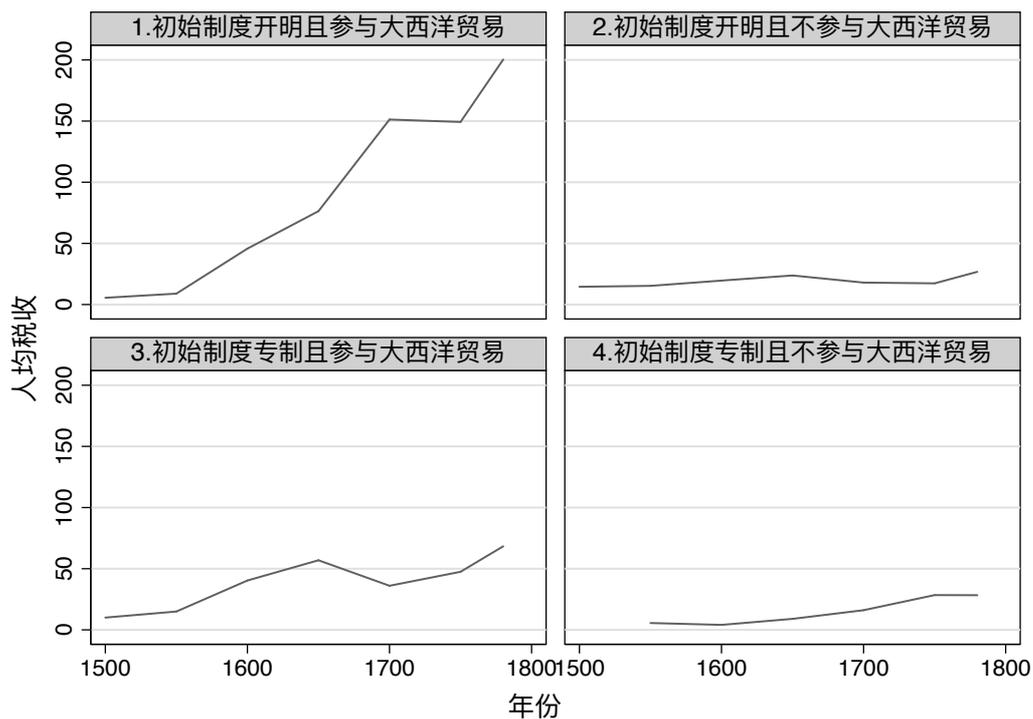
(数据源: 麦迪逊, 2001年)

我们根据契瓦克·卡拉曼(Kivanc Karaman)和谢尔科特·帕慕克(Sevket Pamuk)收集的数据<sup>①</sup>, 采用人均税收指标(因变量的辅助测量指标)并选取每个类型的代表国家, 观察它们在此期间的人均税收变化。从图3中可以看出, 在16世纪

<sup>①</sup> Karaman K. Kivanc and Sevket Pamuk, "Different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rfar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Regim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3, 2013.

后期，即大西洋贸易开始后，第一类国家（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人均税收增长要明显高于其它三类国家，第三类国家（初始制度专制且参与大西洋贸易）也比其它两类国家要高，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要明显低于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从不同国家的人均税收变化上看（图4），第一种类的国家（如英国和荷兰）的人均税收增长是最高的，第二类国家（如波兰）的人均税收几乎是停滞的，而同为第二类国家的威尼斯在1600年后不仅没有增加，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第三类型的国家（如法国和西班牙）的人均有波动，但没有大的变化；第四类型的国家（如奥地利）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的参考案例普鲁士（初始制度专制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在第一波现代化中人均税收对比第一类国家没有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虽然数据并不完整，但我们也可以大致看出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人均税收发展趋势和我们的理论预测基本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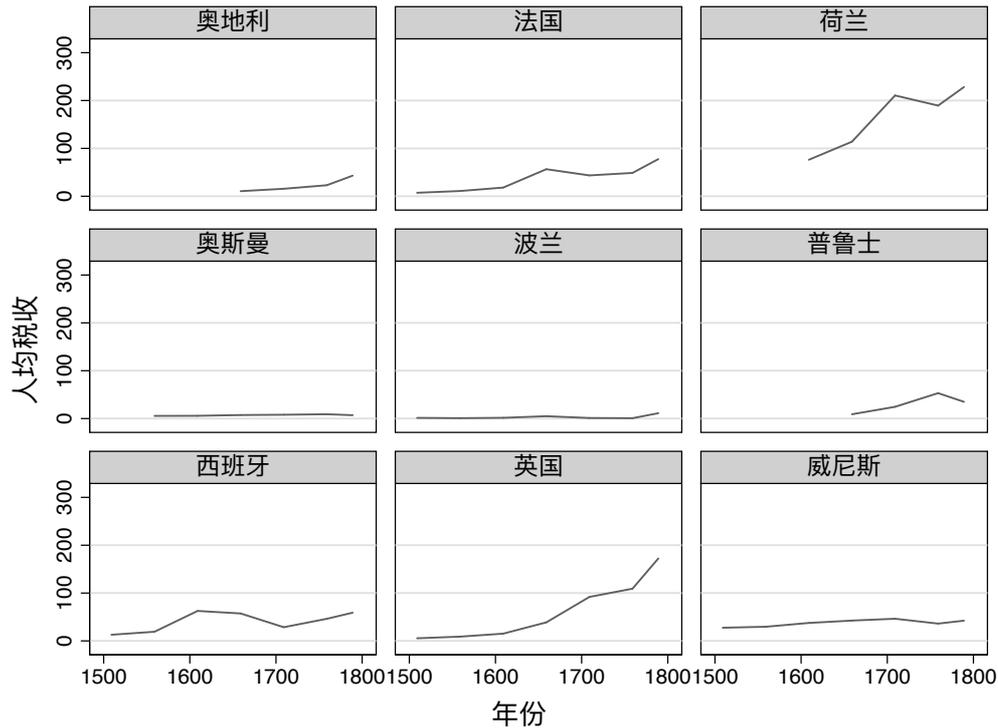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类型国家人均税收比较<sup>①</sup>（单位：克白银）



（数据源：卡拉曼和帕慕克，2013年）

图4 欧洲主要国家人均税收变化（单位：克白银）

<sup>①</sup> 此图呈现为不同类型国家的均值变化图。受到数据的限制，图中的包括的国家依类型分别包括：1) 英国和荷兰；2) 波兰、俄罗斯 (Euro-Russia) 和威尼斯；3) 法国和西班牙；4) 奥地利、普鲁士和奥斯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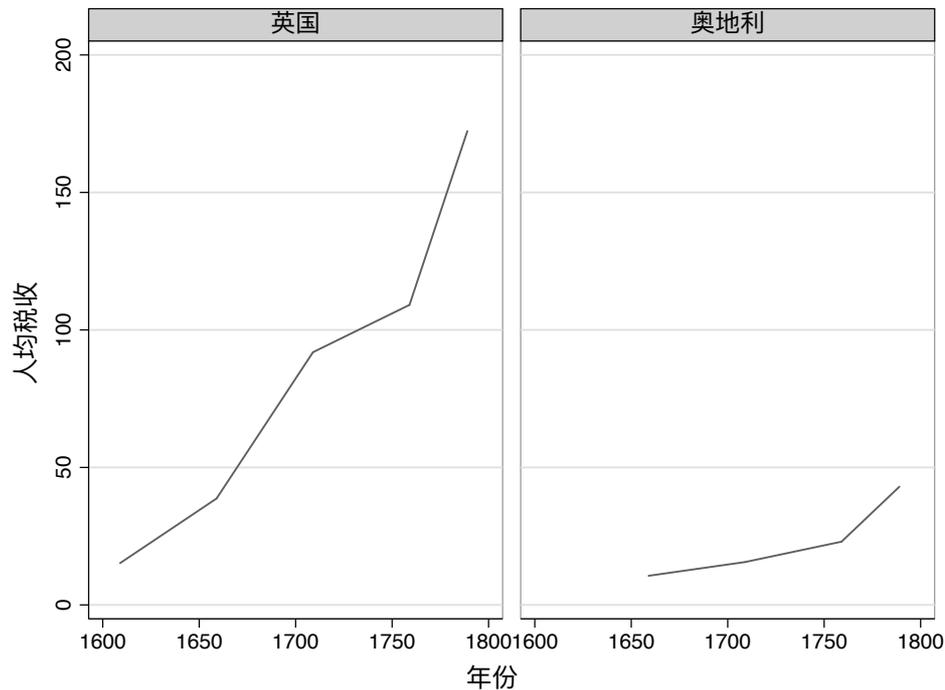


(数据源：卡拉曼和帕慕克，2013年)

我们使用人均税收指标对两个代表性的正负案例（第一类和第四类）案例英国和奥地利进行了比较分析。英国属于我们理论预测中最有可能崛起的国家（起始制度开明且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奥地利属于我们理论预测中最不可能崛起的国家（起始制度专制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在案例分析中，极端最可能表现出因果解释的差异性作用。可以看出，两种国家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极大的差异（图5）：英国16世纪末之后实现了人均税收的快速增长而同时期的奥地利则与之相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这说明，初始制度开明和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与初始制度专制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老牌国家相比，在经济增长上获得了极大的相对优势。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奥地利在1750年之后，人均税收也开始增长，这是因为当时奥地利也开始了改革，但相比英国增长有限。可能的原因是在第一波现代化的后期，一些经济发展较差的“老牌国家”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制度和政策来发展经济，部分内容可参考第一波半现代化的案例分析<sup>①</sup>。

<sup>①</sup> 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5期。

图5 正负案例代表国家人均税收变化（单位：克白银）



（数据源：卡拉曼和帕慕克，2013年）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数据和历史资料来逐一检验我们的主要变量。变量检视有两个目的：一是发掘变量之间对经济分化的差异性影响，或变量之间的优劣；二是检视既有研究变量的有效性，为接下来的定性比较分析奠定基础。

**初始制度。**初始制度指的是大西洋贸易兴起之前欧洲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欧洲中世纪之后一个重要的制度遗产是代议制。中世纪后欧洲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议制度，一种是区域代表制度（territorially-based），一般存在两个代议机构（two-chambers），典型的代表是英格兰、波兰、匈牙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另一种是地位团体代表制度（status group-based），代表性的国家有法国、德国、瓦伦西亚、那普勒斯和西西里等<sup>①</sup>。这个区别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议会组织不同形式会影响到新兴商业阶层和国家的互动，并且议会的不同组织模式还影响到商人阶级能否进行集体行动。在区域代表制度的国家或政治实体中，由于存在上下议会的博弈，统治者并不一定能完全控制议会，不同利益和派别更可能组成联盟，因此商人集体有可能通过既定的制度渠道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在地位团体代

<sup>①</sup> Ertman Thomas,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0-21.

表制度的国家或政治实体中，政治决策比较简单，统治者更容易对议会进行控制或剥夺议会权力。反过来说，在地位团体议会制度的国家中，新兴的商人阶级很难通过制度渠道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制度变革（至少是通过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低。

我们借鉴奥托·辛策（Otto Hintze）和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的研究<sup>①</sup>，根据：1）是否存在强有力的代议机构，特别是区域代表制度，如果存在，则将起始制度视为开明，否则相对专制，或2）是否被外部势力所控制，如果存在，则将其视为相对专制，否则开明，以及3）是否存在频繁的农民暴动（作为参考性测量标准），相对专制的地方，对农民的剥削会比较严重，更可能引发农民暴动，反之则为开明<sup>②</sup>。据于此，我们将起始点为大西洋贸易开始（1575年）时欧洲国家政治制度状况分为如下两类：专制和开明两类。专制国家对民间商业贸易的限制相对较高，开明国家对商业贸易活动更为包容。

从年均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来看，起始制度开明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要高于起始制度专制的国家（表3）。如此看来，起始制度的不同类型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关联性。

表3 两种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

政体类型	国家	经济增长
政制专制	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挪威、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匈牙利和波兰	0.25
政制开明	荷兰、瑞典、瑞士、英国、欧洲俄罗斯、地中海城邦国家（威尼斯等）	0.35

（数据源：麦迪逊，2001年）

**大西洋贸易。**我们将当时的欧洲国家分为参与大西洋贸易和不参与大西洋贸易两类（表4）。从平均经济增长的测量指标来看，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的经济增长要高得多，差不多超过10%。总体上看，大西洋贸易和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关联。

<sup>①</sup> 埃特曼认为连续不断地地缘政治竞争出现的先后顺序使得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形成宪政主义国家，而日耳曼、拉丁欧洲形成绝对主义国家；而议会出现的先后顺序不同使得波兰和匈牙利成为世袭宪政主义国家（而非英国式的官僚宪政主义国家）。Ertman Thomas,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中文版参见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Hintze, Otto,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 Felix Gilbert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sup>②</sup> 数据来自笔者整理的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http://www.britannica.com> 欧洲各国/政体1500年到1800年之间的数据。访问时间：2014年3月-7月。

表4 两种国家类型的年均经济增长比较

参与大西洋贸易	国家	经济增长
是	英国、荷兰，芬兰、挪威、瑞典、瑞士、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	0.34
否	希腊、匈牙利、波兰、东俄罗斯(Euro-Russian)、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和地中海城邦国家（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等）	0.25

（数据源：麦迪逊，2001年）

大西洋贸易的直接影响可能是16世纪前意大利地区占有的经济中心位置在17世纪逐渐被西欧的大西洋国家所取代。当时的欧洲最主要的贸易区有三个：一是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地中海贸易区；二是中东欧地区集中在尼德兰地区的贸易区；三是后来居上的西欧大西洋贸易区。然而，意大利各城邦为代表的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地中海贸易区逐渐衰落了。这个贸易区主要贸易商品包括谷物、盐、腌制品、油、葡萄酒和香料。16世纪后，由于人口数量增长，地中海地区越来越依赖外部世界的供应，英国和荷兰的谷物成为贸易的重要来源<sup>①</sup>。地中海通过意大利的古老香料贸易逐渐被西欧各国强大的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所取代。16世纪以后，欧洲各国不断向地中海渗透并占领其市场，欧洲的经济中心逐渐向西欧转移。

大西洋主要贸易是谷物、盐、腌制品、油、葡萄酒和香料，其商品类型和地中海差不多，两者存在显著的竞争关系。其贸易点集中在直布罗陀海峡到英吉利海峡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一开始的时候，荷兰人控制的里斯本和但泽是大西洋-北欧贸易的主要集中点，荷兰在地理位置上刚好处于正中间的位置，这就方便和其它贸易点进行商业往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表现在谷物贸易上，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主要的谷物市场，谷物贸易和渔业是17世纪荷兰辉煌的商业帝国的核心<sup>②</sup>。也有证据表明，17世纪后半期由于国家间战争导致西欧人口增长停滞<sup>③</sup>。但区域的农产品增加，英格兰取代荷兰成为新的重要谷物净出口国，排挤荷兰的谷物出口霸主地位。这两个原因使得市场对荷兰谷物的需求减少，以运粮为主的荷兰

<sup>①</sup> M. M. 波斯坦 D.C. 科尔曼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 202 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sup>②</sup> M. M. 波斯坦 D.C. 科尔曼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 208 页。

<sup>③</sup> 从 1500 年到 1600 年，西欧人口数量从 57268000 人增长到 73778000 人，同比增长 28.8%，年均增长 0.29%。1700 年为 81460000 人，同比增长 10.4%，年均增长率为 0.10%，人口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和停滞。参见 Ma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2001, p. 242.

航运业逐渐衰退，荷兰的商业资本转而进入政府公债和其它风险较低的有价证券领域，欧洲经济活力中心慢慢地转移到英国<sup>①</sup>。

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汉萨同盟”存在竞争<sup>②</sup>。1604年英国和西班牙签订条约；1609年荷兰和西班牙停战协定，德国失去了中立国的优势，而且还受到战争的影响，17世纪早期，地中海和北欧之间的贸易也落到大西洋贸易者的手中去了<sup>③</sup>。大西洋贸易的导致的结果至少包括：首先，导致欧洲贸易中心的转移。大西洋贸易的兴起逐渐使得传统的地中海贸易和欧洲大陆的相对衰落。其中，大西洋贸易对地中海贸易区的影响最为明显，中世纪的贸易同盟如“汉萨同盟”在同新兴的大西洋贸易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其次，由于欧洲贸易中心的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国家，这就可能使得大西洋贸易的参与国和非参与国之间出现了分裂。大西洋贸易的参与凭借天时地利，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国家有更多的物质力量投入到军队建设、港口建设和船只生产中去。凭借这种优势，大西洋贸易参与国有更大的机会在地缘政治军事的斗争中获胜。而未能参与到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不仅要面对市场的萎缩和税收的减少，还要面对劳动力流失的问题（即，本国居民因受经济利益和驱动移民/逃跑到大西洋贸易国）<sup>④</sup>。因此，参与大西洋贸易与否是这两类国家发展的分叉点；再次，与此相关的是，即便是在那些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中，贸易对不同的国家商人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并且这些国家的商人呈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为什么同样是大西洋贸易国，商人的行为模式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大西洋贸易和国家初始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做出说明和分析。我们接下来也对这两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检视。

**初始制度和 大西洋贸易。**大西洋贸易既是一种商业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大西洋贸易最先是由国家力量来主导的。在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里，强大而专制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王室垄断了海外贸易、严格控制港口和海上贸易通道，从而

---

<sup>①</sup> M. M. 波斯坦 D.C. 科尔曼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 208 页。

<sup>②</sup> 在中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称为是“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的商人共同体了。中世纪晚期由德意志北部城市和德意志海外贸易集团创立的组织，其宗旨是维护相互间的商业利益。13～15 世纪，汉萨同盟是北欧的重要经济和政治势力。汉萨同盟通过镇压劫匪和海盗以保护货物运输，并兴建灯塔以保障航行安全。

<sup>③</sup> E. E. 里奇，C. H. 威尔逊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16 世纪、17 世纪不断扩张的欧洲经济（第四卷）》，第 170 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sup>④</sup> F. L. Zande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Holland's Economy: Merchant Capitalism and the Labor Market*,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此书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角度对荷兰经济的兴衰做了解释和说明。

使得普通的商人直接参与到大西洋机会比较少；相对而言，虽然荷兰和英国也存在王室权力，但他们对贸易的控制并不像西班牙和法国那样严酷，因此普通商人的机会相对多一些。初始的政治制度是否为专制制度对商人群体参与到大西洋贸易的可能性有影响，由于存在制度性的约束，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国家的普通商人群体不可能像英国和荷兰那样迅速成长。反过来，作为一种外部冲击的大西洋贸易对政治制度也会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是直接。那些在大西洋贸易中受惠最多，而且普通商人受惠最大的国家，商业贸易的冲击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并改变了社会结构，而这种变化更可能出现在商人阶级强大的非专制国家，商人阶级弱小的专制国家则可能走向衰落或停滞。

**改革同盟。**改革同盟是由初始政制和大西洋贸易的影响下而形成的一个利益集团同盟。在那些初始政制专制的国家，新兴的商人阶级的被排除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在政治博弈中，专制王室家族垄断了主要的商业贸易，即便特许商人进行大西洋贸易，商人的活动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王室也不太可能让一般商人分享贸易成果，更有甚者不允许一般商人从事大西洋贸易(如西班牙)。在初始政制更为开明的国家，商人更容易参与大大西洋贸易中，受到的贸易限制更少。商人在大西洋贸易中实力不断壮大，他们要求更自由更开放的贸易，这会受到王室的限制，形成利益竞争。因此，他们要求进行制度变革，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逐步形成新兴贵族和商人相结合的改革同盟，他们和旧利益集团的博弈将决定制度变革的结果。参与大西洋贸易可能有助于改革同盟的形成，但在一些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依然也可能限制商人的贸易活动，而在未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也可能出现商人阶级是国家主要统治力量的情况（如当时的东欧地区，商人在政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改革同盟的形成不仅仅需要外部刺激（大西洋贸易）来形成动力，改革同盟的存在不必然导致制度变革的社会结果。从平均经济增长来看，存在改革同盟的国家要明显的高于不存在改革同盟的国家，一个是0.35，一个是0.24（表5）。

**表5 改革同盟国家**

存在改革同盟	国家	经济增长
是	英国、荷兰、地中海城邦国家、芬兰、挪威、瑞典、瑞士、丹麦、希腊、匈牙利、波兰和东俄罗斯（Euro-Russian）	0.35
否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和德国	0.24

（数据源：麦迪逊，2001年）

**初始经济规模。**以欧洲各国15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标准，我们对两类国家进行了比较。在1500到1820之间，初始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几乎是初始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的增长的两倍。单纯从经济增长上看，此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和初始经济规模呈反比关系。

**国家大小。**由于小国特别是地中海小国的数据缺失，我们不太容易对两类国家进行直观的数据比较。但对国家大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定性比较分析部分进一步检验。

**表6 初始经济规模**

初始经济规模	国家	经济增长
大	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	0.26
小	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葡萄牙	0.48

（数据源：麦迪逊，2001年）

综上所述，我们对初始制度、大西洋贸易和改革同盟，以及初始制度和大西洋贸易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和检视。我们有如下基本发现：初始制度、初始经济规模、大西洋贸易和改革同盟四个变量都和国家崛起有关系；从单独变量考察上看，变量基本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但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往往是复杂的，多种原因的组合可能导致了相同的社会经济结果。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采用定性比较分析对上述变量进行检查。

### QCA 分析结果

我们研究的案例一共为23个。根据QCA的编码法则，我们变量编码如下：1) 初始制度为大西洋贸易开始时的各国的政治制度，相对专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 初始经济规模，我们取15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美元等价估值），大于10亿美元为1，小于为0；3) 国家规模大小取1500年的人口规模，大于100万为1，小于为0；4) 在此期间如果一个国家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5) 改革同盟主要看商业阶级和国家精英的互动情况，存在改革同盟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6) 因变量用1500年到1820年之间各国的经济增长来测量，高于平均值0.29则赋值为1，低于平均值则赋值为0。初始经济规模、国家大小和经济增长数据来自于麦迪逊·安吉斯（Madison Angus）的研究<sup>①</sup>。初始制度、改革同盟和大西洋贸易来自笔者的收

<sup>①</sup> 参见 Madison Angus,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Paris: OECD,

集和整理。<sup>①</sup>我们使用复旦大学复杂决策中心开发的“全功能多值QCA (fmQCA)” 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sup>②</sup>。赋值如下 (表7)：

表7 变量赋值表

编号	案例	初始制度	初始经济	国家规模	改革同盟	大西洋贸易	国家崛起
1	奥地利	1	1	1	0	0	0
2	比利时	1	1	1	0	0	0
3	丹麦	0	0	0	1	1	1
4	芬兰	0	0	0	1	1	1
5	法国	1	1	1	0	1	0
6	普鲁士 (德意志)	1	1	1	0	0	0
7	意大利	1	1	1	1	1	0
8	荷兰 (尼德兰)	0	0	1	1	1	0
9	挪威	0	0	0	1	1	1
10	瑞典	0	0	1	1	1	1
11	瑞士	0	0	1	1	1	1
12	英国	0	1	1	1	1	1
13	葡萄牙	1	0	1	0	1	1
14	西班牙	1	1	1	0	1	0
15	希腊	1	0	1	0	0	0
16	威尼斯	0	0	0	1	0	0
17	维琴察	0	0	0	1	0	0
18	佛罗伦萨	0	0	0	1	0	0
19	热亚那	0	0	0	1	0	0
20	那不勒斯	0	0	0	1	0	0
21	波伦亚	0	0	0	1	0	0
22	米兰	0	0	0	1	0	0
23	罗马	0	0	0	1	0	0

**吻合度检验。**QCA分析软件会给出每个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吻合度 (consistency)，可以理解为统计分析自变量的显著性。吻合度在模糊集分析中的基本原理，是通过看条件变量之于结果变量的隶属度 (degree of membership) 来评

Development Center, 2001, p. 242.

<sup>①</sup> 数据来自笔者整理的大英百科全书 (网络版) <http://www.britannica.com> 欧洲各国/政体 1500 年到 1800 年之间的数据。访问时间：2014 年 3 月-7 月。

<sup>②</sup> “全功能多值 QCA” 软件由复旦大学复杂决策中心 2015 开发。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buka632/Fm-QCA>。和此前的 QCA 软件相比，fmQCA 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具体的说明，见 fmQCA 的说明书。

估某种结果产生的充分性(sufficiency)。吻合度取值介于0到1之间,吻合度越高,表明条件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充分性越高<sup>①</sup>。

将自变量的正反取值,我们得到10个条件变量(如参与大西洋贸易和不参与大西洋贸易为两个不同的条件变量)。在吻合度检验中,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吻合度最高,为0.63,但依然未达到必要条件要求(如果样本在20个左右,吻合度大于0.85可视为接近充分条件<sup>②</sup>),其它9个变量的吻合度则更低(表8,“+”表示“是”,“-”表示“否”)。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单一因素能够成为国家兴起的充分条件。从吻合度来看,其它相对比较高的变量分别是:初始政制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存在改革同盟和初始经济规模小(除初始经济规模小之外,基本和我们的理论预设一致)。

表8 吻合度检验

条件变量	吻合度
初始制度(+)	0.12
初始制度(-)	0.40
改革同盟(+)	0.37
改革同盟(-)	0.14
国家大小(+)	0.33
国家大小(-)	0.27
初始经济规模(+)	0.14
初始经济规模(-)	0.37
参与大西洋贸易(+)	0.63
参与大西洋贸易(-)	0

**覆盖度检验。**覆盖度(coverage)通过计算条件或条件变量组合对于结果变量的交集(overlap),来测量某个变量或变量组合能够解释结果的大致范围,可以理解为统计分析中的R方,覆盖度能够用来评估条件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如果某个条件变量的吻合度很高,但是覆盖度很低,我们不认为会是通往结果变量的重要路径<sup>③</sup>。如果条件变量的覆盖度计算结果为1,则可视之为必要条件。QCA分析发现,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存在改革同盟和初始经济规模小

<sup>①</sup> 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 Ragin Charles,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45-54.

<sup>②</sup> Ragin Charles,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46.

<sup>③</sup> 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 Ragin Charles,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pp.54-61.

四个变量的覆盖度最高。其中，参与大西洋贸易达覆盖度达到1。说明这四个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且参与大西洋贸易是欧洲国家崛起的必要条件：凡是崛起的欧洲国家崛起必须参与大西洋贸易。（表9，“+”表示“是”，“-”表示“否”）。覆盖度检验结果支持我们选择这四个变量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

表9 覆盖度检验

变量	覆盖度
初始制度 (+)	0.14
初始制度 (-)	0.86
改革同盟 (+)	0.86
改革同盟 (-)	0.14
国家大小 (+)	0.57
国家大小 (-)	0.43
初始经济规模 (+)	0.14
初始经济规模 (-)	0.86
参与大西洋贸易 (+)	1
参与大西洋贸易 (-)	0

上文的吻合度分析的一个发现是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能够独立解释欧洲的崛起。但QCA还提供了另一种分析路径，即可以检验不同条件变量之间的组合能否解释同一结果变量。分析发现，三种变量组合的覆盖度和吻合度同时超过0.85，表明它们不仅显著度高而且能解释大部分的案例，是导致结果变量出现的重要路径。其它变量组合要么吻合度太低或覆盖度太低而不能成为通往结果的路径。吻合度高且覆盖度高（能够较好对经济崛起结果变量进行解释）的三种组合分别是（表10，“\*”表示条件变量同时存在）：

第一种变量组合为：国家崛起=“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即初始政制开明且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

第二种变量组合：国家崛起=“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存在改革同盟”，即初始制度开明、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且存在改革同盟的国家。

第三种变量组合：国家崛起=“参与大西洋贸易\*初始经济规模小”，即参与大西洋贸易且初始经济规模比较小的欧洲国家。

表10 条件变量组合分析结果

编号	变量组合	案例	负案例
1	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	英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	荷兰
2	初始政制开明*存在改革同盟*参与大西洋贸易	英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	荷兰
3	初始经济规模小*参与大西洋贸易	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葡萄牙	荷兰

在上述三组条件组合中，第一种和第二种组合所对应的结果（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是一样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将存在改革同盟作为结果变量，初始制度开明和参与大西洋贸易作为条件变量，单独做了一次QCA分析。结果发现，“初始制度开明\*参与大西洋贸易”的作为条件变量组合的吻合度达到了1，这表明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是存在改革同盟的充分条件。这符合我们的理论出发点：我们的理论将改革同盟视为欧洲国家崛起的中介变量(或者说是中间结果)：即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更可能形成改革同盟，并且通过改革同盟的改革这样一个大概过程来实现国家崛起。这样的一个理解也符合张宇燕和高程以及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的研究发现<sup>①</sup>。

我们将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条件组合合并，最终得到了第一波现代化中崛起国家两种条件组合：1) 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以及2) 初始国家规模小且参与大西洋贸易。其中，参与大西洋贸易作为条件变量覆盖了所有的成功案例，这表明在大西洋贸易兴起之后，不能积极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几乎不可能崛起。在第一波现代化中，两类国家脱颖而出：一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二是初始经济规模小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因而，最终获得第一波现代化入场券的国家分别是：英国、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葡萄牙七国。

这里恰恰彰显的QCA分析的优点：它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同时也不认为现代国家兴起是一座独木桥。更重要的是，QCA分析也弥补了此前的案例研究的一些缺陷。此前，大部分案例研究都集中在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这几个（潜在的）大国<sup>②</sup>。而我们的QCA分析却发现，西欧的一些小国反而更加具备实

<sup>①</sup> 张宇燕、高程：“美洲白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2005.

<sup>②</sup> 如诺斯、托马斯和我们之前的研究。参见：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

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因此，此前的一些研究有样本选择偏差。这表明，多种方法的混合运用是实证社会科学的必然趋势。在方法论上，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定量定性之争”。<sup>①</sup>

### 荷兰：奇怪的负面案例？

荷兰不仅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也是初始经济规模小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但最终为何没有获得第一波现代化的入场券？借助相关史实和数据，我们认为荷兰未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长期持续性的战争。荷兰在此期间卷入了长达80年的战争：即1568年到1609年的荷兰独立战争（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和1618年到1648年的欧洲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荷兰在大西洋贸易兴起前就开始了独立战争，持续40多年。在独立战争中，荷兰仅军队伤亡就达十万余，平民伤亡更是不计其数<sup>②</sup>。独立战争后没几年，荷兰又卷入欧洲三十年战争，士兵伤亡数万人<sup>③</sup>。

持续80年的战争对荷兰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三个严重后果：一是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经济增长下滑，经济绩效远不如同期的其它欧洲国家<sup>④</sup>。如图6所示，几乎是在独立战争一开始，荷兰的经济增长就呈直线下滑；二是战争导致人口增长率低，发展经济所需的人力资源不足。如图7所示，和同时期的英国相比，荷兰的人口增长相当缓慢；三是备战导致荷兰无法深度参与大西洋贸易，未能充分利用优势条件来发展经济。

综上所述，虽然荷兰在大西洋贸易兴起之后就具备现代化的核心条件，但却并不具备现代化的外部环境。这也说明，在第一波现代化中，国际环境对国家崛起本身也

---

的兴起”，华夏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年第3期；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5期。

<sup>①</sup> 对此问题系统讨论，参见唐世平：“超越定性定量之争”，《公共行政评论》，2015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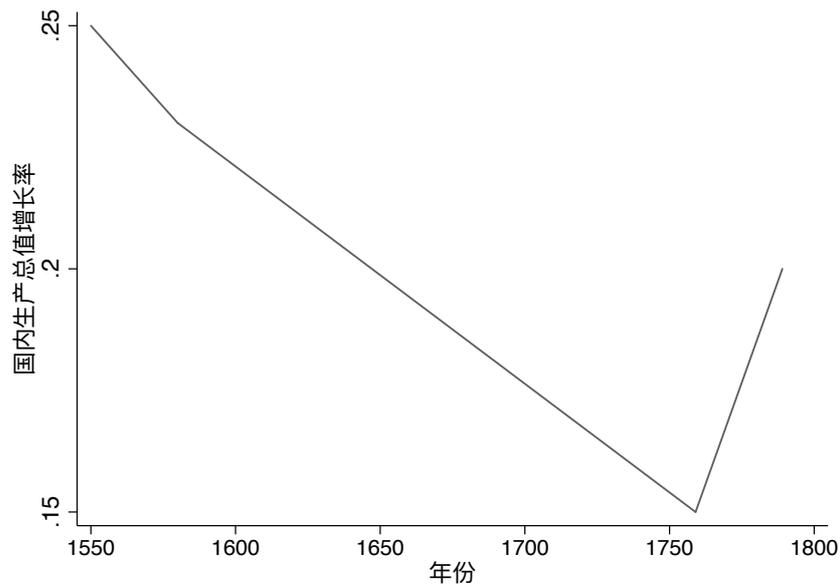
<sup>②</sup> Clodfelter Micheal,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s: A Statistical Encyclopedia of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494-2000*,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08, pp. 14-16.

<sup>③</sup> Clodfelter Micheal, *Warfare and Armed Conflicts: A Statistical Encyclopedia of Casualty and Other Figures, 1494-2000*,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08, pp. 35-39.

<sup>④</sup> 同期的欧洲其它国家平均经济增长达到26%（1550-1800），荷兰则是从未达到过26%。数据来源：Karaman K. Kivanc and Şevket Pamuk, “Different Paths to the Modern State in Europ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arfar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Regim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No. 3,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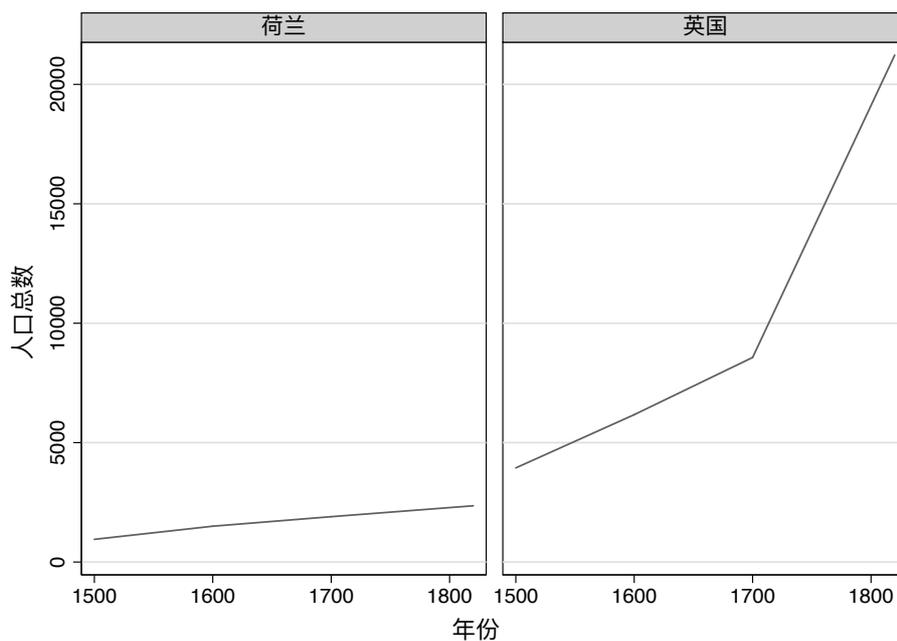
是重要的。受到数据限制，我们的QCA分析无法捕捉到足够信息。因此，我们将荷兰作为一个特殊案例来分析。对于战争频繁的国家，我们在分析其崛起条件的时候，尚需要考虑其战争的影响。一种显然的可能性是，尽管一般认为欧洲国际系同中的战争是驱动国家不断创新的动力之一，在战争中消耗过大的国家很难有好的结果。这一点应该在未来的案例分析中将得到更多关注。

图6 荷兰经济增长趋势（单位：100%）



（数据源：卡拉曼和帕慕克，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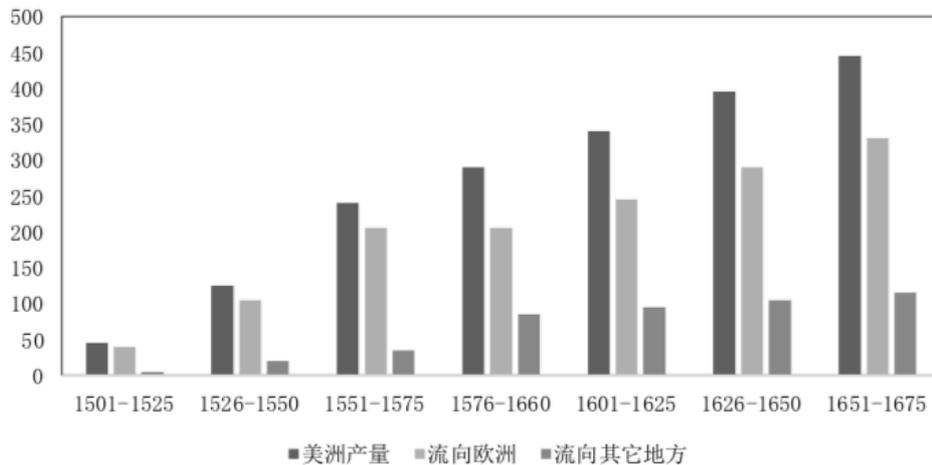
图7 英荷两国人口增长比较（单位：1000人）



（数据源：卡拉曼和帕慕克，2013年）

**辅助假设。**我们辅助假设中提到了利益分配特别是财富分配可能引发的政治经济后果。我们在文章结束之前对其进行讨论。在1493年到1820年期间，世界上超过85%的白银产量和70%的黄金产量都来自美洲，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流入欧洲，只有少部分流向世界的其它地方（图5）<sup>①</sup>。

图5 美洲白银流向（单位：吨）



（来源：詹姆斯·特蕾西，1990年）

由于美洲大量优质廉价白银的流入，欧洲的白银和黄金生产失去了竞争力，新世界成为了全球稀有贵金属的最大生产地。在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里，开采出来的黄金和白银的要上缴王室，其中秘鲁20%，新西班牙10%<sup>②</sup>。大西洋贸易、远洋贸易和殖民活动使得大量财富流向西欧，但财富的增多并非直接导致商人阶层的崛起，也未能直接导致经济增长。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利用外来财富来发展经济，而有的国家却不行？事实上，外来财富可能推动新商业阶级的崛起，也可能对新商业阶级的阶级没有帮助。这取决于如何分配流入的大量白银。在第一波现代化的国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财富分配模式：一种是财富投入再生产（积极反馈）；另一种是财富用来享受和挥霍（消极反馈）<sup>③</sup>。

<sup>①</sup> James D. Tracy,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24.

<sup>②</sup> James D. Tracy, *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39. 新西班牙是前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总督辖区之一，于1521年设立。其范围包括现在的美国西南部和佛罗里达、墨西哥、巴拿马以北的中美洲、西印度群岛的西属殖民地，委内瑞拉和菲律宾群岛也一度属这一辖区。当时的秘鲁也是重要的产地，由西班牙控制。

<sup>③</sup> 大西洋贸易和财富对国内政治的作用机制更为细致的探讨可参见我们之前的研究：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

积极反馈毫无疑问有助于商业利益群体力量的壮大，而消极反馈则不利于商业利益群体力量的壮大。而如何使用流入大量白银和国家的商业模式有重要的联系。在那些完全是王室垄断和主导贸易的国家中（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流入的大量白银和黄金主要进入了国王的腰包，普通商人无法染指。而在那些普通商人也能够参与贸易的国家里（如英国和荷兰），虽然国王还是会拿走一大块，但是也有部分财富流入民间，而正是这小部分来之不易的财富，被勤俭节约的聪明商人用来在投资，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使得这个商业阶层逐渐变得强大而有力，从而改变了社会的利益格局，并最终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制度。

## 五、结论

通过对第一波现代化国家兴起的定性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如下三个因素对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崛起非常重要：初始制度、大西洋贸易和初始经济规模。其中，参与大西洋贸易为必要条件，两类国家在第一波现代化中更可能率先崛起：一是初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二是参与大西洋贸易且初始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在早期现代欧洲国家中，英国、丹麦、芬兰、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是率先获得第一波现代化入场券的国家。和其它获得入场券的国家类似，荷兰拥有现代国家崛起的条件，但最终失败告终。一个可能性的解释是频繁的国家间战争阻碍了荷兰进行制度变革，从而未能和英国一道成为现代化的排头兵。本研究旨在探索那些因素和因素的组合影响到第一波现代化的成败，对其中的更为细致的因果机制和具体案例的比较分析可参见同为“重新解释现代化”项目的姊妹篇的研究<sup>①</sup>。

从因果机制上看，我们认为在起始制度专制且未能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商业阶层基本不可能通过获得新的利益成长壮大，改革同盟不存在，变革动力不足，国家崛起可能最低。在起始制度专制且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能够通过大西洋贸易获得新利益来成长，但其成长受到体制限制，有形成改革同盟的动机，但难以形成改革同盟，或者即便形成改革同盟，改革同盟能力也不足以推动制度变革，国家崛起可能性低。在起始制度开明且参与到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能够迅速壮大，有助于改革同盟形成，改革同盟能力较强，通过制度变革可能

---

<sup>①</sup> 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黄昏：法国与西班牙的改革之殇”，《世界政治与经济》，2016年第3期；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政治与经济》，2017年第5期。

性较高，国家崛起可能性最高。在起始制度开明且不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其商业阶层成长有限，形成改革同盟的动力不足，改革同盟能力不足，国家崛起的可能性较低。而初始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反而有可能通过更积极的参与大西洋贸易和制度改革来获得经济增长。此外，如何分配从大西洋贸易以及殖民地贸易获得的财富对西欧国家经济增长有辅助作用：如果外来财富被政府垄断或用于消费，则对实现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如果外来财富用于再生产或贸易，则有助于商业阶级的崛起，对国家崛起有促进作用。

针对第一波现代化中等样本的研究对象，我们应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不仅克服了大样本回归分析观察值不足的缺点，也克服了案例比较由于样本过大难以进行控制的缺陷。虽然定性比较分析和其它研究技术一样有自身的缺点（如无法进行历时性的分析或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但它较好的展现了不同的因素和因素的组合是如何影响现代国家崛起的。此外，对于为什么在获得现代化入场券的七个国家中，大部分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和英国都获得了较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只有英国率先进行制度变革，成为现代霸主？这些问题的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更深入和细致的探索，我们的研究也为未来的早期现代国家兴起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

我们的研究表明，现代国家的兴起并非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而是一系列重要因素组合与互动的结果。国家崛起并非是大国的专利，也并非是在当下发达国家的娱乐场。国家崛起的道路也不只一条。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是任何一个现代化崛起国家的必由之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及时进行制度变革和创新是早期现代国家兴起的钥匙。对于当下的国家发展而言，特别是对还处于现代化发展困境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度僵化，“闭关锁国”和不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只会将国家推入衰弱的深渊，只有坚持不断的对外经济开放和对内制度改革，才有机会实现长期可经济发展，崛起为现代强国。

最后，按照我们的分析框架和结果，同时期的明朝和清朝都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简单地说，没有大西洋贸易这样的外来冲击（而不仅仅是白银的流入）所带来的可能的阶级或集团的重组，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缺乏获得现代化的入场券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也是一个不开明的专制国家，皇权强大，且幅员辽阔，因而难以形成强大的改革同盟。如此，许多此前关于为何中国没有内生性地产生现代化的讨论其实意义不大或者说是对社会变迁中的时空约束缺乏理解的结果：

1840年前的中华帝国不能够内生性地产生现代化是一个几乎不需要讨论的问题<sup>①</sup>。换句话说，此前关于1840年前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其实是在考察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案例<sup>②</sup>。

因此，1840年后中国真正的要害问题是：在西方叩开帝国的大门之后，为何中华帝国不能迅速放下身段去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技术，从而快速地实现现代化，而是顽固地抵制西方的先进制度、技术和思想，或者是只想学点皮毛？同样的问题也是其他所有未能在“第一波现代化”和“第一波半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面临的紧迫问题<sup>③</sup>。这些问题都将是我们的关于“第二波现代化”和“第三波现代化”的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一如既往地，对这些问题，只有好的比较政治研究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比较可靠的回答。

---

<sup>①</sup> 如肯尼斯·彭慕兰、张宇燕和高程等学者对东西“大分流”的研究。参见：Pomeranz Kenneth,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中文版参见肯尼斯·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

<sup>②</sup> 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能案例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年第1期。社会科学研究中时空对案例选择的重要性，可参见：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年第3期（待刊）。

<sup>③</sup> 正如我们此前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第一波现代化”国家仅限于西欧的少数几个国家。“第一波现代化”中成功的国家成为了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学习和追赶的对象。